

在关注房伟近几年的小说创作之前,我对作为青年批评家的房伟印象深刻。房伟对王小波和其他当代作家的研究,充满真知灼见,是他们这一代批评家中的佼佼者。房伟曾经很长时间在山东的高校任教,引进到苏州大学后,我们成为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我逐渐了解到房伟在做文学批评的同时,一直创作小说、诗歌,十多年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房伟这几年写抗战历史题材的小说引发广泛关注,2017年获得江苏紫金山文学奖之优秀短篇小说奖。我的感觉是,“小说家房伟”大有压过“批评家房伟”的趋势。

房伟既批评又创作,是我理想中的现代文人的最佳状态。我曾经多次谈到,我期待自己像现代史上许多文人那样,在大学里教书、写作、写论文、写小说或写其他。房伟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房伟的写作状态远比我想象的要好,他从容不迫,热情而不失冷静。教学、研究的任务已经很重,但还不时发表小说新作。疲惫的我每次见到毫无倦容的房伟,都要感慨他浑身散发的“正能量”。

现在即将付梓的《猎舌师》汇集了房伟近年来创作的以叙述抗战历史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在写作这些小说之前,房伟做了大量的史料准备,又以批评家的本能选择了叙述历史的方法和形式,展开自己关于历史的想象。这样一个收集资料、进入历史情境、再艺术创造的过程,有不少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的话题。

抗战与历史,都是当下文艺重要的关注热点,也是创作突破的难点之一。说起“历史小说”,人们往往首先想到“长篇”历史小说。通常的印象是,“长篇”的时间跨度、空间容量,及厚重历史主题,更能表现我们对“史诗性”的想象。这也是中国小说叙事传统的一个特点。《史记》之所以称为“无韵之离骚”,就是因为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有着文学化的构思剪裁、布局谋篇,有着文学化的人物塑造与故事编写。中国文学之中的历史,偏重其传奇性与故事性,历史观多为循环史观与帝王史观。比如,《三国志》《隋唐演义》这类演义小说。这种“文史不分”的情况,在西方社会也存在,早期西方史学著作充满文学笔法,比如,希罗多德的《历史》有丰富的故事细节,恺撒的《高卢战记》可看作为优美的散文随笔。中世纪史学,表现为上帝意志的“历史阐释学”,有神迹等神秘主义东西。这种情况,直到兰克、吉本、蒙森、卡尔等近代启蒙史学家出现后,具有科学理性意味的“真实性”,才逐渐成为历史第一要素,文学的成分、道德评判的成分,才逐渐退出历史叙述。

这也影响到西方文学对历史的表现。西方的现代历史小说,从号称“历史小说之父”的司各特的《艾凡赫》,一直到狄更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以及当代的尤瑟纳尔、库切的作品,都充满了理性精神和哲学意味,在追求历史真实基础上,

《猎舌师》(序)

□王尧

探求人 与历史 与社会的复杂关系。西方历史小说更关注历史真实性,更追求历史理性精神,也就是从一个更高的理性精神层面,来看待历史轨迹,而不是依靠某种意识形态力量。比如,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以虚构的罗马皇帝哈德良的回忆录为线索,不仅为我们展现罗马时期栩栩如生生活场景与历史风貌,而且表现了作家对于生死、历史与存在等很多严肃问题的思考。著名西方历史学家吉本就说过,历史是由血与火、人类的罪行与愚蠢组成。这种对历史“性恶论”的观点与历史理性精神,是我们的历史文学匮乏的。我们的历史文学,除了传奇性演义特质之外,底色则有着浓厚虚无天命观与道德化价值判断立场。在此之上,则是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历史观念,历史成为意识形态图解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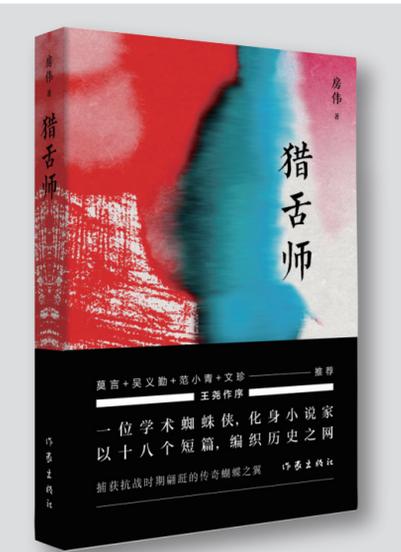
在当代中国,历史小说多是长篇巨制,追求史诗性。这种史诗性除了文学的野心,也有意识形态进化论的影响。新时期之后,新历史小说兴起,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对宏大叙事的质疑,但又游戏性、戏仿颠覆的叙事方式之下,造成了历史叙述的贫弱,追求“六经注我”的自我意愿,也对历史理性造成了负面消解。很多小说把历史解读为虚无史、欲望史。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失去最初新鲜感之后,就因为历史理性的匮乏而陷入叙述困境。目前活跃于银屏的“抗战神剧”、“历史神剧”,除了民间的历史传奇思维,也要追究到新历史主义的负面效果。电影《白鹿原》就将一部探索中国百年历史的严肃小说化为田小娥的“骚情史”,这无疑足发人深省的。新世纪之后,史诗性的长篇历史小说再次兴起,以此表征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但似乎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很多长篇历史小说,动辄四五十万字,大多是几大家族争斗,百年巨变沧桑,或写战争霸,成就一代明君。这些长篇历史小说,徒有史诗体量,却无史诗的精神容量与思想含量。它们既缺乏历史反思的深刻性,也匮乏历史理性精神。所谓宏大表象之下,这些作品大多还是较保守的历史观和文学观,有的甚至还在追求所谓“雄主帝王”史观,实在陈腐不堪。

好的历史小说,应是文学的感性体验与想象力结合历史真实性与理性诉求的产物。几个方面不可或缺其一。文学史上的优秀中短篇小说也不少,比如,诗人冯至的《伍子胥》、陈鹤翔的《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新时期以来抗战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就有尤凤伟的《生命通道》、周梅森的《大捷》、阿成的《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等名作,但创作中短篇小说,尤其是短篇历

史小说,难度却不小。如果一味追求灵巧,就会成为不成体系的零散片段;如果只注重史诗性,则会让作品变得沉闷不堪,丧失鲜活的个人体验与强烈的故事代入感。要在精短篇幅之中,快速进入一个感性历史情境逻辑,将读者带入到独特的历史氛围,又能在有限篇幅破除局限,展现宽广的历史视域与历史反思,这的确不容易。同时,注重历史精神,也不能放弃历史小说的娱乐性,如何将历史故事讲述得动人心魄,在传递历史真实信息的同时,给人以智慧启发与故事性愉悦,也是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努力的方向。这些小说非常注重逼真的历史现场感的还原,细节描写的镜头画面感很强。

房伟的这组历史小说,大部分是短篇,最长的2万多字,但写法结构还是短篇的规模与气质。他的做法是当一个“蜘蛛侠”,结成“历史之网”,利用特色各异的短篇小说集集体,造成一种长篇小说效应,但又能保存每个短篇的独立艺术和思想价值,从而捕获那个飘荡的“历史蝴蝶”的精魂。每一篇都试图找到一个新的表现视角,呈现出新艺术手法,颇具匠心。有的小说颇具悬疑侦探氛围;有的灵动自如,写世情写人物;有的利用美食、惊悚等类型文学手法;有的借助《聊斋》手段,以狐鬼写人性;有的则更像历史随笔散文,淡化情节,探讨哲理;甚至有的小说还借助符号学理论,以理论入小说,追求理论与文学文本的融合。短篇小说素有“社会生活的横截面”之说,更擅长通过细节勾勒,片段呈现与留白艺术,表现个人化叙事与日常书写,即便写历史,由于篇幅限制与题材拘囿,往往也是草蛇灰线,点线结合,“留白”大于具体“历史写实”。这样的写法固然灵动,富于象征隐喻性,但又让人感觉不够厚重。房伟的这个系列抗战小说,可看做是历史小说小说的“组合拳”,将短篇小说善于写“点”的特长发挥出来,以点而织成“网面”,以具体历史场景“横截面”,造成对抗战历史“全景式”重新理解。虽然这些小说篇幅都不大,但从叙述空间讲,涉及日本北海道、屋久岛,越南的河内,中国的则有南京、北京、上海、苏州、扬州、济南、沂蒙山、微山湖根据地、山东莒县、香港、台湾等。

在叙述时间上,房伟小说有抗战各个时期的展现,早至1928年的济南五三惨案(作为1931年“九一八”抗战的前奏),晚至日本战败投降的故事,同时,也涉及当下现实时空对抗战的理解。从人物来讲,它包括了很多不同层面的人物,中国方面既有蒋介石、汪精卫这样的历史大人物,也有军队高层军官,如起义将领、叛逃的师



本书是青年作家房伟的系列抗战小说,可看做是历史短篇小说的“组合拳”,将短篇小说善于写“点”的特长发挥出来,以点而织成“网面”,以具体历史场景“横截面”,造成对抗战历史“全景式”重新理解。房伟如同一位“蜘蛛侠”,在《中国野人》《幽灵军》《副领事》《地狱变》《猎舌师》等18篇小说中跳跃、穿梭,结成“历史之网”,利用特色各异的短篇小说集集体,造成一种长篇小说效应,但又能保存每个短篇的独立艺术和思想价值,从而捕获那个飘荡的“历史蝴蝶”的精魂。

参谋长、潜伏的日伪官员,日军方面则涉及副领事、师团长、大佐等高级军政人员。但但这些小说更多刻画了很多非常有特点的小人物,比如,军统底层人员、投毒杀敌的中国厨师、八路军战士、根据地民兵连长,自发抗战的普通村民、内心痛苦的汉奸、自杀的日军中尉、伪军小军官、日本军医、日军逃兵等。作家试图进入这些不同历史人物的复杂心灵,不是简单地“道德判断”和“意识形态规训”,也不夸大“历史的同情”,给予他们过多历史特权,而是将他们放置在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以严肃的历史理性精神,考察他们和大历史之间“晦暗难明”的关系。

这些历史小说,就是大大小小的“历史心灵”编织出来的历史,效果在于跳出国仇家恨的道德叙事局限,从历史精神高度审视这段民族国家的历史。比如,小说《手香》再现了南京屠城的惨剧。被日军强暴的女学生和当汉奸的表哥,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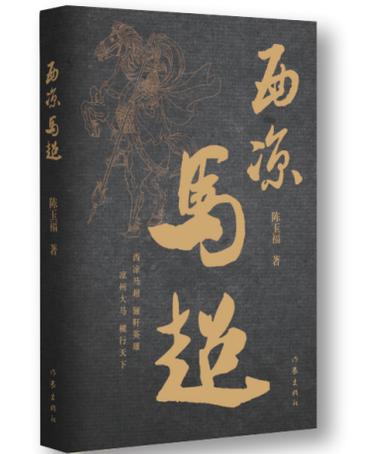
了紧张对峙关系。小说从女学生的视角,再现了表哥令人难以理解的生存意志。小说没有美化表哥的软弱妥协、圆滑世故,也没有遮蔽他残存的善良与保存同胞的善举。丑陋的战争将美丽的女学生化成斩断敌人手掌做炖菜的女杀手。人性是复杂的,面对屠杀,女学生和表哥都做出了不同人生选择。小说将道德审判和人性审判的双重权力,都交给了读者。小说对于江南地区面对日军侵袭的反应,令我们想起加拿大抗战史专家卜正民。他的著作《秩序的沦陷》就从很多史实细节为我们勾勒了众多历史小人物。无论抗日志士、汉奸,还是所谓“合作者”(cooperator),考察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既要坚持人性的宽容视野,又要予以冷峻的历史批判。

我注意到,这组小说还注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性”关系。《指南》《鬼子妮》《还乡》《五三》《白光》等小说,都从历史与当下的联系性入手写作。《指南》以电脑游戏虚拟抗战景观,反思当下现实青年的心灵迷茫;《还乡》以女记者对抗战期间发生的悬案的访查为线索,再现了历史的多维度可能性;《鬼子妮》虚构日军逃兵在中国的生活,实写“文革”对人性的摧残;《白光》以抗战军队的鬼魂再现,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沉闷无聊;《五三》以失业在家的老记者,访查爷爷对历史大事件的参与入手,写出了人生对意义寻找的重要性。小说《五三》写了一只飘飞于历史迷雾的蝴蝶,这组小说也出现了很多有关“雾”的描述。比如,《还乡》中雾气缭绕的神秘大山,《杀胡》中山瘴弥漫的小村,《肃魂》里埋藏无数尸骨的元湖上空的迷雾。这雾气是历史迷雾,有无限的神秘气息,既充满魅力,又有几分狰狞,它隐藏着无数血泪,无数爱恨情仇,也隐藏着无数可能性,偶然性,人性隐秘的挣扎与晦涩哲思。“蝴蝶”就是穿越历史迷雾的心灵力量。

卢卡奇谈到小说与史诗的复杂关系时认为,史诗和小说这两种客体形式,并不是按照创作态度,而是按照它们在创作时发现的历史哲学事实区分开来的。小说的时代,生活的“外延整体”不再显而易见,感性的生活“内在性”已经变成了难题,但这个时代仍然有对于“总体”的信仰。这种“总体性”,是作家面对个人化的生存现实,面对人与自然分离的人造世界,所执著进行的一种整体建构性的“赋形”努力。伴随着中国全面的现代化转型,中国历史小说必须反思其“史诗性”品质,是用一种意识形态正确的话语给予规训,还是从个人化的视角,理性地看待中国的民族国家发育过程的种种心灵怪离与酷烈创痛,并寻找出一种总体性的心灵主体状态,也许是摆在很多中国小说家面前的迫切任务。

在这个意义上,我对房伟的小说创作怀有更高的期待。

(摘自《猎舌师》,房伟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传世英雄的侠骨柔情

——读陈玉福长篇小说《西凉马超》 □白桦

作,形成了今天名扬中外的文化旅游标志——铜奔马,这既充分表现了马超青春时期的爱憎情仇,又从自己的角度解读了绝世的铜奔马原型的由来。

就阅读的主要感受来看,《西凉马超》笔墨相对集中,故事情节引人入胜。通过马超与阿诺、阿离、钟雅、央馨儿、耿玉蓉等女性在不同时期或显或隐的爱恋之情,写出了马超与刚劲英勇相随相伴的至情至义和侠骨柔肠。处于动荡不安又四处征战的乱世,马超与所有的女性的爱恋,最终都以悲剧收场,但却由此显示了央馨儿、阿离、耿玉蓉等不同女性的鲜明个性,以及青年马超极其丰富的情感世界与令人唏嘘的悲壮命运。这种偏于儿女情长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超的形象,也改写了人们对于马超的既有印象。

作为一个喜爱“三国”、喜欢马超的读者,读《西凉马超》,既有意外的收获,又有不足的遗憾。收获是马超少年、青年时期的故事,这些在《三国演义》里没有的事件,极大地满足了喜欢马超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尤其可圈可点的是“隔代遗传”给马超母子带来的灭顶之灾和千古奇冤,以及少年马超一战成名、青年马超维护古丝绸之路、解决“东西大滩”民族纠纷等故事。少年、青年时期的马超也有不俗的表现。为了保护龙首山土匪抢走的官粮,一战成名,成了远近闻名的少年英雄;青年马超为了维护古丝绸之路商道的畅通,以及成功地解决了“东西大滩”几十年的民族纠纷,闻名遐迩,被外国客商和当地的百姓誉为“神威大将军”。这一系列流传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民间故事,被作者巧妙地嫁接到了《西凉马超》中,给小说增色不少。

《西凉马超》留下的遗憾是马超的几个人生亮点没有加以重视,如堵截曹操、大战许褚、陈五虎将,为刘备封王领街上书等,或者表现得过于简略,或者干脆略过。这些原本应该浓墨重彩地予以大书特书的地方,都没有得到应有的描写和突出的表现。因为作者在马超人生命运的书写上有些重前轻后,重柔轻刚,事实上把马超写成了一定的悲情人物,西凉马超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悲凉马超,使得马超的形象柔情有余,英气不足。当然了,我想作者这样处理,可能是因为三国时期的马超大家都熟悉,所以没有必要放开手脚去写。可作为一部描写马超为主的历史小说,即便是《三国演义》里写了这些故事,也不能吝惜笔墨,更应该展开来大书特写。这应该是“三国”迷的期待,也是不少读者的期待。

陈玉福的写作,有着力求打通严肃与通俗之间长篇小说的界限的明显追求,这是值得赞许的。但从作品呈现出来的信息看,有时会偏于严肃,有时则偏于通俗,怎样在严肃与通俗之间取得一个较好的平衡,进而打造更能体现自己艺术水准的精品力作,这可能是陈玉福今后需要不断努力的更大的任务与目标。

家国情怀与民族精神的赞歌

——读冯国仁、冯宏宇的《高车家族往事》 □兴安



争,是东北地区所有社会矛盾最尖锐、最集中、最复杂的时期。小说正是在如此复杂的典型化的环境中,塑造了吴恭太这样一个典型人物。吴恭太,达斡尔高车家族的第14代传人吴海山的儿子。他自幼顽皮,经常闯祸,多次受到老师的管教,但他聪明好学,机敏多智。长大后因为爱上被许了别家亲的女孩子绪花,而不得不走上逃婚之路。这引发了两个家族的矛盾,被许了婚的鄂邦杰不甘心,组织了抢婚队,试图抢回绪花。于是,两家展开了一个逃婚,一个抢婚的激烈冲突。而此时,早已对绪花垂涎三日的日本教官寺田之助,却秘密组织劫婚队,趁双方不备,劫持了绪花,将她糟蹋之后,关进了慰安所。虽然她被解救出来,但已染上了梅毒,最终死于非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两家的争斗,恰好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小说无疑借寺田之助的形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的野心和嘴脸,也无意中隐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围剿主张抗日的共产党的历史事实。

绪花的死,让吴恭太一下子成熟了,也让他明白只有参加革命,拿起武器,才能解放国家,挽救自己的民族于水火。于是,他加入了抗日联军,利用自己家传的高车技

艺,当了军需官,并且有效地完成了抗战军需物资的后勤供应。日本投降后,他一边参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一边投入到剿灭土匪的斗争中。无论是在辽西山区,道路泥泞,一般车辆无法运行的艰难环境下,还是在大兴安岭高山峻岭的险恶地形中,他指挥着高车,保证了战斗物资的供应,并在太平山战斗中,利用高车杠杆的原理,装备了霹雳火球抛掷器,歼灭了盘踞在太平山的残余土匪。革命熔炉锻炼了吴恭太,也造就和完成了他从一个普通百姓到一名光荣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成熟和圆满。所以,吴恭太这个人物形象,我以为是成功的,他的成长道路,也印证了中国的少数民族,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民族的翻身解放,走向人生的辉煌。

小说的时间跨度不长,篇幅也比较精简,但是人物却众多,这无疑增加了小说创作的难度。但是,冯老先生根据自己丰富的人生经验和生活积累,将这些众生相,寥寥几笔,便活灵活现地刻画出来。为了村民的利益而与税卡长冯仲业相爱并以身相许的娜莱雅,她聪明善良,可以说是小说中非常完美的女性形象,也是达斡尔族女性的典型代表;富有正义感、无私地帮助达斡尔人的汉族税卡长冯仲业;还有嫉恶如仇、机智勇敢而又心地善良、乐于助人 的么斯库。小说赋予了么斯库典型性的达斡尔人的民族性格,即对社会上的不公平现象零容忍,他不畏强暴,敢于直面日本人的枪口。他从死人堆里救出并保护了日本遗孤铃木贞子,即能引起族人的误解,也不后悔,他当上民兵副队长后,敢作敢为,不徇私情等等,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以为,这些丰富、鲜明的人物群像,构成了达斡尔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共同大家庭,也展现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多民族关系。

总之,《高车家族往事》是一部具有史诗框架和人文情怀的难得作品。它不仅歌颂了达斡尔民族对自己传统手工艺的珍视,即“追求创新、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导向,还有提倡公正、提倡信誉、提倡包容”(引自《高车家族往事·后记》)的民族精神,而且高度赞扬了他们热爱祖国、保卫家园、同仇敌忾的献身意志和英雄气概。